



尋找林徽音

文字工作者

王家鳳

公視連續劇「人間四月天」引起觀賞熱潮，但影像中所塑造的「一代才女」林徽音，卻遭到林氏後人嚴厲抨擊，認為劇中人「扭捏作態」，和本人「毫無相似之處」，並且期望能「還歷史真相一個公道」（聯合報，民89年5月11日）。

透過閱讀，我們又能夠還原出一個什麼樣的林徽音？

林徽音何許人也？

「林徽音生於滿清末年，病逝於五〇年代中期，是一個不壽卻跨越了幾個時代的歷史人物。在文化圈裡，歷來有才女之譽，而又以美麗聞名。然而一社會上了解她的人不多，無聊的傳聞卻不少。」編選《林徽音文集》的大陸學者梁從誠，在臺灣版前言之中，這樣形容他的母親。

研究民國文人的學者梁錫華，曾經分析林徽音「湮沒無聞」的原因有三：出道太遲、作品太少、題材太狹，加上左派當道的大環境，因而在文學史上插足無門（聯合文學，1985年3月號）。

林徽音（1904-1955，1935年後改名林徽因，本文皆用原名）系出名門，才學兼優，1920年代在美國賓州大學習建築得到美術學士，又在耶魯修得舞臺設計碩士學位；學成後，在1930至1950年代的北平文化圈，其實相當活躍，後來儘管重病纏身，也一直寫作不輟。只是當時局勢動蕩、播遷頻仍，而她的文學創作與建築專業，又多依附在浪漫詩人徐志摩，和建築史家梁思成的赫赫名聲之下。1950年代之後，這些名字都成了舊社會毒草、大反動。林徽音能夠被社會了解的機會就更少了。

倒是無聊的傳聞，顯然在任何一種政治氣候下，好事者都能口耳相傳、樂此不疲。有人以

為徐志摩干冒大不韙，開中國現代離婚濫觴，林徽音扮演了關鍵角色，甚至是促使者。而選擇作為建築學者梁思成之妻；梁家的成員似乎又包括為林徽音終身不娶的哲學家金岳霖。

大思想家選她為媳，浪漫詩人對她癡狂，印度大哲為她寫詩，邏輯學家因她不婚，建築史家丈夫更視她為不可或缺的事業伴侶。就連病入膏肓，瘦得不成人形時，林徽音在當年女學生眼裡，竟也「像戀人似的對她著了迷」（林洙語，見《建築師梁思成》，臺北，都市改革出版社，1991年5月初版）。這樣一位擅詩能文、才貌雙全；捲起袖子可以趕圖設計新房舍，穿著旗袍也能爬樑測繪古建築；晚年設計國徽，身後被形容為「一身詩意千尋瀑，萬古人間四月天」的奇女子，究竟是何許人也？

費慰梅筆下的林徽音

由美國哈佛大學中國研究專家費正清夫人—費慰梅女士執筆完成的《Liang and Lin: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's Architectural Past》（美國賓州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）一書，資料豐富，引證詳實，對有心想要在無聊傳聞外，進一步瞭解這樣一位傳奇女子的讀者，這是本引人入勝的傳記。

費氏夫婦與林徽音相識於1932年的北平，此後成為梁家常客，返美後兩家之間有大量信函往來，也曾短暫重逢，友誼始終不渝。本書的基礎，就是寄自林徽音、梁思成夫婦以及金岳霖的長信，加上梁訪美時，費慰梅刻意記錄的訪談，再佐以《梁啟超年譜》、《梁思成全集》等相關著作寫成。作者甚至找到當年梁氏夫婦留美時代的記錄，以及遊歐返京時，同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美國夫婦寫下對兩人的回憶。至於冷戰期間，兩家失去聯繫後的部分，則摘錄梁思成繼室林洙女士的著作，以竟其功。



林徽音原籍福建、成長於北平。5歲開蒙，有國學根柢，中學以後受英語教育。16歲隨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的父親林長民遊學英國，大學與研究所的學業則在美國完成。她曾在致費氏夫婦的信中表示：「我是在雙重文化的教養下長大的，不容否認，雙重文化的接觸與活動對我是不可少的。在你們倆真正進入我們的生活以前，我總是覺得有一種精神上的貧乏需要營養…」(費著91頁)。在寫給異國知己的長信中，林徽音顯然可以相當自在地傾吐心聲；而費慰梅由另一種文化的角度，來訴說林徽音的故事，也顯得親切坦然，又不失深刻。

於是我們彷彿置身其間，看到了林徽音娓娓吐露早年家庭戰爭的創傷、抱怨家事的紛爭瑣屑，甚至憤憤描述大家大姑如何在半夜從梁家帶走女兒，為的是不讓她「從舅舅舅媽的朋友那裡染上激進的婚戀觀」(頁92)。

徐志摩最大的貢獻

提起徐志摩，費慰梅指出，徐比林大上10歲，曾經扮演了領路人的角色，把林徽音導入英國詩歌與戲劇的世界。但徐的熱情「並沒有在這個缺乏經驗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反應」，而對於當時不過16歲的林，「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、他的追求，和對她的熱烈情感所迷住了」。至於徐志摩的離婚事件，林徽音自己長年與傷心透頂的失寵母親住在一起，根本無法忍受「一個失去愛情的妻子被拋棄，而自己卻要去替代她的位置」(頁13、14)。

費慰梅以為徐志摩「對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貢獻」，是引見摯友金岳霖。這位眾人口中的「老金」，在徐志摩去世之後的歲月裡，接著扮演了林徽音在文學創作上，忠實的評論人與鼓勵者。費慰梅坦然指出，金岳霖「當然是愛她(林)的，但是無私地和坦誠地愛她，他沒有把她從家庭拉走的想法。思成和孩子們也都愛他信任他，他實際上已經融入了這個家庭」(頁48)。書中也引了許多金岳霖寫給費氏夫婦的長信，從轉述梁氏夫婦近況，到詳細分析林徽音與母親之間的種種情緒糾葛，可見他在梁家調解仲裁、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
除了解答讀者對傳聞的好奇心外，費慰梅女士多所著墨、也是書中最為動人之處，還是梁氏夫婦在戰亂流離與病痛的折磨下，對於解讀與維護中國古建築，所投注的熱情與毅力。正如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史景遷在序中所說：「當我們細細地品味關於他們的故事的時候，…清晰地感受到這對堅強的夫妻所迸發出的生命之光。」相對於這股強烈之光，種種無聊傳聞就顯得微不足道了。

從「靈魂伴侶」到「欽定媳婦」

1997年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發行中文版《梁思成與林徽音：一對探索中國建築史的伴侶》，作者並另行增添新序。可惜的是，在這本合譯之作中，許多出處明確的重要大段引文部份，多未能參照原文，以致於連徐志摩筆下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」的名言，都成了「要是我找到了她，那是我的運氣；要是我找不到，那是命該如此」(頁25)的贅句。此外，相關人名如：劉子凱、王受慶…等，也都出現錯誤的音譯。(民國89年6月，臺北時報文化重譯出版《林徽音與梁思成：一對探索中國建築藝術的伴侶》)

目前坊間還可見到另一本由中國人寫作的林徽音傳記小說。名為：《林徽音傳：從徐志摩的靈魂伴侶到梁啟超的欽定媳婦》民國82年由臺北世界書局出版。署名林杉的作者以全知觀點的小說筆法，試圖重新建構林徽音的感情世界，其中也對於林徽音在文學上、建築上的成就，有夾敘夾議的寫法。但作者對書中觸及的特定地點，卻似乎略顯隔閡。

比如該書中寫到：「倫敦的霧，最先是從康河的漣漪中蕩漾出來的」，「皮爾皇宮拖著修長的身影，這座閣樓式的建築物一是中國風格的建築」…等段落，都讓讀者摸不著頭腦。前者或許可以解釋為象徵式的文學寫法，但後者描述林徽音與友人在布萊頓海邊度假談心，「皮爾」似指當年海上劇院(Palace Pier)，而位於城中心的皇宮(Royal Pavilion)雖以其中國風情的內部裝潢聞名於世，但外觀實為印度式建築。



本書對於作者林杉完全沒有介紹，但從書中行文用語及資料的運用看來，與大陸出版同名作家的《一代才女林徽因》應同出一源。臺灣版在文字上，少了大段堆疊的形容語句，精簡許多，也不見中共建國前後的章節以及詩、文、信件の引文。書後附有年譜，臺灣版無參考書目，另附詩作8首。

坊間傳記「有負於林」？

1980年代中期以來，兩岸三地也都出現過林徽音作品選集。其中1990年大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香港三聯出版社合編《中國現代作家選集林徽音》，收錄林徽音的小說、散文、劇本、詩歌，並有照片年表、詩與小說評論，及梁從誠、卞之琳、費慰梅的懷念文章。除了編校上的錯字，可讀性很高。

但這些陸續出現坊間的文集與傳記，在梁從誠看來，無論編、著，不但「沒能向社會介紹一個真正的林徽音」，甚至「實在有負於林」。費慰梅的傳記雖好，但當時的中譯本「譯文又不大讓人放心」。1999年，他終於親自編選兩卷文集，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。文集在兩個月內售罄再版。民國89年3月，臺北天下遠見出版繁體字版單冊文集。

比起其他文集，百花版由作者之子親編，自然「可能是目前搜集林徽音遺存各類文字最全的了」。文學卷裡的詩歌、散文，都加入了新發現的逸文，也另添寫作時間極早的譯作一篇。書信部分則蒐集刊選其留學時代至晚年的私人信件，成為最特別的文件資料。梁從誠在編敘中指出，這些信件極其真切地展現林徽音在文學、建築、政治、感情、家庭的心路歷程，也是反映當時社會最可靠的原始材料。

在林徽音致胡適的幾封信中，對林、徐早年的一段感情，有很坦率直率的剖白；而與費正清夫婦的通信，文筆斑斕生動，1930年代風雨欲來的京城文化圈、抗戰時知識份子在長沙、昆明、重慶間的遷徙流離，都像一篇篇觀察入微的報導文學。幾封英文信以原文刊出，也讓讀者有機會讀到連哈佛出身的費氏夫婦都羨慕的文采。

百花版完整呈現「建築的林徽音」

百花版文集最難得之處，當屬長達480頁圖文並茂的《建築卷》。本書終於呈現了「建築師林徽音」的面貌。建築卷文章涵蓋的範圍，除了古代建築勘測紀錄及通訊、古代建築經典分析、建築史、北京建築文物介紹以外，也包括當前城市建設前景設計、引介國外城市規劃個案…等，很能看出這位女建築師繼往開來的企圖心。

儘管人們每每談及林徽音在建築上的成就時，總有夫唱婦隨、依附陪伴的印象，但從其文集中或可看出，就像選擇梁思成作為終身伴侶，文學的林徽音是磅礴於中的神來之筆，而傳統古建築則是她一生投注的生命志業。而林與梁在這方面所共同締造的成就，實則緊密相連，不可二分。

作家卞之琳在三聯版文集的評論中說的好：「（林）表面上不過主要是後者（梁）的得力協作者，實際上卻是他的靈感泉源。」梁思成在《圖像中國建築史》前言中也明白感謝這位「妻子、同事和舊日同窗」於一身的伴侶。沒有林徽音的合作與啓迪，他強調，「我對中國建築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，都是不可能成功的。」

臺北天下版單冊《林徽音文集》，仍以「文學的」林徽音為主，只由《建築卷》中選錄兩篇林、梁共同署名的文章，也捨劇本未刊。臺北藝術家出版社則在2000年5月出版《林徽音建築文集》。

藉著為母親編選一部周備的文集，梁從誠試圖向社會介紹一個「真正的林徽音」。有趣的是，堂堂跨入21世紀，風靡臺灣的電視連續劇裡，大陸演員所詮釋的一代才女，赫然是朵幽怨哀絕、一路垂淚的苦心蓮，以致引來林氏後人嚴重抗議。從文字資料看來，上個世紀初那位傾倒眾生的佳人，氣質趣味的確相當不同。

苦心蓮或摩登女？

1928年，徐志摩描繪甫由新大陸學成歸國的林徽音「豐度無改，渦媚猶圓，談鋒猶健，興



致亦豪，且亦能吸煙捲喝啤酒矣」（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致陸小曼信）。也就是這個摩登新女性的形象，使得梁任公夫人生前一度不肯答應讓她進門作媳婦。至於她健朗的談鋒，新聞界前輩蕭乾在回憶錄裡，引當年美國在華記者史諾的話，形容林徽音在眾人聚會中老是「愛搶話」、「包半場」，一但「說起話來，別人幾乎插不上嘴」。林徽音的脾氣，也是文字資料中頗多著墨的。在致胡適的幾封信中，為徐志摩康橋日記下「落」了「氣糊塗了」的林徽音，下筆撻伐文友凌淑華「小氣極了」「也該學點大方」「沒有看得起過她」……今天讀來，氣焰猶炙。曾經與林徽音共同在山西旅行調查的費慰梅，在傳記中抱怨這位敏銳幽默的同行者，一但疲累或情緒驟來，總是不顧旁人地大聲咒罵，「可讓人難以忍受」。而梁從誠在提及早年母親對孩子的撫愛時，也不忘強調「有時卻是脾氣急躁」的。

能說善道、性急直率、能吸煙捲喝啤酒，或許可以說明林徽音不像是個苦行僧式的傳統美人，但也並不代表她就是個民初豪放女，倒更讓人想起徐志摩所崇拜的英國作家哈代筆下那種勇於嘗試、始終忠於自己真實感受的「新女性（new woman）」。

林徽音終其一生都在爭取自己的天空。婚前，她果斷選擇自己的人生伴侶與前途，對自己過去的感情「我也不悔，我也不慚愧」，且視作「人格上知識上磨練修養的幫助」（1931年致胡適信）。留美的第一年，為了爭取自己享受新大陸的自由空氣與她在兩性朋友中受到的歡迎，不惜與梁思成爆發多次「激烈的爭吵」（費著《梁與林》頁24）。婚後，林徽音一如今天的職業婦女，在事業與家庭中掙扎，深怕自己就此「平庸處世，作妻生仔的過一世」（致胡適信）；她在家中安排了吳爾芙所謂的「自己的房間」，以便專心寫作。大半個世紀前，林徽音不諱言自己作家事時「總是心不在焉，心裡咒咒手頭的活」，寫作時意識到正在忽略自己的家，也「一點不感到內疚」（致費信）。甚至在感情上，也勇於面對自己的感覺，主動對丈夫剖白，並得到瞭解與信任。

充滿希望，又備受挫折的時代

早在26歲時，林徽音就證實罹患在當時視作絕症的肺結核，此後大半生其實受苦受病痛折磨。但她作為人際磁場中心的吸引力，正因為她既不像遺孀兒，也不是捧心西施，只要病況略有好轉，就「又是談笑風生」，她是個「永遠快樂，任何美的東西都能使她興奮和愉快」的人（林洙語）。閒時，她會在午後斜陽中，坐看映灑在天花板上緩緩移動的光影；戰爭的陰影逼近，她還騎驢閒逛，貪看「月光下靜靜的小廟裡橫斜的疏枝」，享受「漫步橋頭的自得和愜意」；當逃難汽車在土匪出沒之地拋錨，扶老攜幼、發著高燒的林徽音，還忙著欣賞「玉帶般的山澗，秋山的紅葉，和白花花的茅草」；到了流離失所、貧病交加的異鄉異地，她在病榻邊擺滿中西典籍，仍然忙著與丈夫合作編寫中國建築史。

翻讀林徽音文集，我們悄然穿越大半個世紀，進入一個熱情豐沛、創意奔放的心靈，並且伴隨著她走過那整個充滿希望，又備受挫折的時代。在林長民帶著美麗的女兒所處的倫敦社交圈中，我們看到了威爾斯、亞瑟威利、喜龍仁等文人在座，忽然間明白了為什麼西方作家提及中國時，普遍誤解、輕蔑，而這些人的著作，卻能讓人不時興起難得的知遇之感。到了北京梁家的客廳沙龍裡，週末時高朋滿座，只是這回換了長大的小女孩侃侃而談。從京城到陪都，印都詩哲泰戈爾、小提琴家克萊斯勒、中國專家費正清、史坦因、李約瑟，也都領受過一代才女豐沛的活力，與東西兼容的文化涵養。

我們也乘著騾車搖搖晃晃，在空間裡上山下鄉，造訪「前面站著城樓，旁邊睡著小廟」的偏遠村落；在時間中穿唐入宋，為中國古建築測繪解碼；在社會階層底下走向普羅大眾，體驗與都城文化圈全然不同的常民生活。我們於是明白，沒有「建築的林徽音」行萬里路，就不會有林徽音詩作裡的建築意象、「山西通訊」裡活脫生動的小城素描，或「窗子之外」的幡然自省。而有了「文學的林徽音」，我們才有



機會感同身受地隨著梁氏夫婦，為古建築的發現與整理興奮難當，也為北京古城牆被處以極刑而「幾乎急瘋了」。

從煙沒無聞到家喻戶曉

1955年，林徽音以51歲英年病逝北京。在梁從誠看來，母親生命的最後六年，也就是「新中國」成立後的六年裡，似乎真正的完成了自己。她從「梁思成的太太」跳脫而出，正式受聘為清華大學一級教授、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、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、北京市第一屆人代會代表。遺憾的是，她一生志業所繫—古建築的研究與保護工作，尤其是北京城前景的規劃，也在這時成為她生命中「重大的失敗」。

林徽音眼睜睜地在病榻上，看著五百年來從改朝換代的兵災中得以完整倖存的北京古城牆，卻在所謂的「和平建設」中，被當作封建餘孽徹底剷除了；梁氏夫婦悉心規劃的城牆公園計劃，徒留紙上風光。而林徽音生前最不願意見到高層玻璃盒子「千城一面」的難堪，後來也在「改革開放」後赫然湧起。文革期間，梁思成頂著「反動學術權威」的大帽子被踢出系館，將他與林徽音在病榻上共同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所畫的圖稿，親手付之一炬。林徽音八寶山墓碑上「建築師林徽因」字樣，也橫遭清

華紅衛兵砸毀；而「文學的林徽音」成熟時期的詩作文章，在浩劫中毀失殆盡。

「林徽音不只是一個人，她的存在更是一種文化現象，」梁從誠提醒我們看到，就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，曾經有那麼一群幸得舊學陶養，又受西學訓練的文人，在幾乎說得上是「學貫中西、通古博今」的格局下，用他們的生命精髓，試圖勾繪古國未來的藍圖。可惜的是，20世紀的中國，卻如史景遷教授所形容，竟是「一個浪費至巨的世紀」白白枉費了數不清的時機、資源、才華、生命。林徽音與她的丈夫在戰亂流離中、在重症折磨下，為傳統建築研究鞠躬盡瘁之後，「被批鬥、被侮辱、被折磨，又在死後，在一切都為時太晚時，被承認、被讚頌」。

閱讀林徽音，我們看到作為一個人，一個中國女人，在扭曲的歷史命運中，不斷試圖掙脫社會既定的枷鎖，完成她自主的一生；我們也看到作為中國學院中現代建築專業的先驅者之一，在一個普遍懷疑傳統的時代，矢志解讀維護古建築。一代才女，實則處處超越了她的時代；卻又在一場歷史狂瀾中，不遑時賞、湮沒無聞。而跨入21世紀，兩岸共同打造的「影像林徽音」，在大眾媒體中以還淚捧心的懷舊包裝出現，畢竟風靡觀眾，家喻戶曉。詭譎歷史想要告訴我們的真相，實堪玩味。

